

刘孝标《注》与《世说新语》的保存与传播

孟 真(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世说新语》作为一部不足十万字的志人小说,在漫长的岁月淘洗中,完好无损的流传至今,其中原因颇引人思量。笔者认为刘孝标为《世说新语》做注,使其价值和意义更为厚重,对《世说新语》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关键词】《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保存与传播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典小说从混沌中走向成熟和独立的时期,此时产生了大量的小说作品,但时至今日,当时蔚为大观的魏晋小说仅剩断简残编,但《世说新语》一书却以完整的面貌保存下来,令人称奇。

《世说新语》分36门共1130则,正文还不足10万字,却广受赞誉,乃至妇孺皆知,这与《世说新语》杰出的艺术成就是分不开的。但从本质上讲,《世说新语》仅仅是一部记载轶闻趣事之书,茶余饭后谈资而已,同时代的小说如《语林》之类,也堪称小说佳品,却未能经受住时间的淘洗。个中就里,刘孝标为《世说新语》所做的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刘知几在《史通·补注》中说:“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可见注有助著作的保存和传播。

《隋书·经籍志》中著录:《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可见,从唐代开始,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与正文已密不可分,不带注的《世说新语》慢慢消失了。刘孝标的《注》涉及1500余人,内容毫无疑问比原文更加繁富。刘孝标注征引广泛,保存了大量的散佚文献,也使《世说新语》更加丰富厚重,使《世说新语》的价值大大增加,研究刘《注》应该成为《世说新语》研究的一部分。出色的注释使《世说新语》流通靡绝,当代才得以看到魏晋志人小说的原本风貌。

细加分析揣摩,刘孝标《注》对于《世说新语》的传播的要有如下几方面的贡献。

一、疏通文意

刘孝标为《世说新语》疏通了文意,成为阅读和接受《世说新语》的门径。疏通文意是传统注释的主攻方向,在刘《注》中已经明显弱化,但并未完全摒弃,《世说新语》中的故事年代久远,今天已经难以读懂,刘《注》仍发挥着疏通文意的重要作用。疏通文意需要做文字训释、意义疏通两个方面的工作。

1、文字的训释

《注》中仍有一些文字的训释,虽并不用力于此,但刘孝标并无丝毫懈怠,对文字训释保持了高度谨慎的态度,采用收录前代经注大家的经典注释的方法,来解释文字。例如《政事》20条“一日万机,哪得速”条注引《尚书·皋陶谟》云:“一日万机,孔安国曰:‘机,微也。言当戒惧万事之微’”,又《任诞》3条“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解,五斗解酲”条注:“《毛公注》曰:‘酒病曰酲’”。诸如此类,虽在注文中并不显眼,却彰显着孝标做注的谨慎态度。

2、文意的疏通

《世说新语》所载录故事,不乏难以理解之处,刘孝标随文施注,释疑解惑。例如《纰漏》5条:

蔡司徒渡江,见彭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两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后向谢仁祖说此事,谢曰:“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

《世说新语》所录的是一个幽默诙谐的故事,但谢仁祖的话却并不容易理解,刘孝标及时的原文下做注曰:

《大戴礼·劝学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蟠之穴,无所寄托者,用心躁也。”故蔡邕为《劝学章》,取义焉。《尔雅》曰:“虫骨蜺小者劳,”即彭蜺也,似蟹而小。今彭蜺小于蟹,而大于彭虫骨,即《尔雅》所谓虫骨蜺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状甚相类。蔡漠不精其大小,食而致弊,故谓读《尔雅》不熟也。

原文的不明之处因注释豁然开朗,此处的幽默不是粗俗之属,嬉笑怒骂间并非毫无内涵,在疏通文意的同时,更让读者领略了人物风度和时代文化气息。

二、意义的多重化

刘孝标的注使《世说新语》成为了一部具有多重意义的著作,受到不同读者的重视,其厚重的价值让其得以流传久远。

1、史料价值的增强

《世说新语》是一部出入于史之间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魏晋时期的社会面貌,但其毕竟具有较强的小说性质,在叙事上从不求详尽,现在人们更愿意将《世说新语》作为小说去读。但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说新语》都被当做史书,得到了比其它志人小说更多的青睐,这其实多为《注》所造成的,史书的地位历来高于小说,《世说新语》也就因其史料价值,其得以流传至今,我们得以在时间的无情淘洗之后,得观早期小说的真面目。

在刘《注》的引用书目中,史部书目数量庞大,引用次数也很多,据统计,《注》引《史记》14处,《魏志》24处,王隐《晋书》引用53处,引《晋阳秋》则多达115处,尤其是《晋阳秋》一书,从注中看为一本极有研究价值的史书,但后世已经亡佚,《世说注》中的引用更显珍贵。《世说注》中引用史籍有时长达数百字,如《规篇》篇1条注引《史记·滑稽·列传》、《贤媛》篇2条注引《汉书·匈奴传》、《排调》篇55条注引《战国策》均篇幅漫长。《世说注》这类注文不仅充实《世说新语》人物形象的作用,更补充了原文中简短的故事,索引出了《世说新语》简略描写下覆盖的历史资料,从知识性和历史文化上都大大丰富了原作,《世说新语注》本身浓厚的史料文献特性,明显提高了《世说》的文献价值。

2、古书辑佚的宝库

《四库全书总目》中这样评价刘孝标《世说注》:“孝标所注特为典贍……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

《世说注》广储博引史籍,于今天看来是相当珍贵的。它不仅可使我们了解到孝标时代尚有留存的有关晋代书籍的面貌,更可以从其所引用的数百处晋代人和事的记载中,使后人知晓已佚史书的具体内容,具有极为重要的辑佚补缺的价值。辑佚宝库之说并非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历代辑佚古书的学者往往从刘孝标注中有所获益,刘孝标《注》是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鲁迅《古小说钩沉》的重要资料来源,也是一些早已散佚的史籍的整理工作的主要依托。由于《注》在辑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世说新语》得到的重视远远大于一本供人赏

(下转011页下)

这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这并不是对刘勰观点的完全否定。

三

刘勰认为文章的风格和作家的风格有关系,那作家风格和什么有关呢,《体性》篇中刘勰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刘勰认为才能出于天赋的资质,但学习在开始时就要慎重,就如制木器或染丝绸,功效在初时就已显示;等到器物制成,颜色染好,再要改变就困难了。所以儿童学习写作,一定要从雅正的体制开始,顺着根本寻究到枝叶,这样思路的转换自然能够圆满妥帖。八种风格虽然不同,而自有法则贯通其间,就像车轮之有轴心,辐条能聚合起来。所以应该摹仿某一体制风格以确定创作的方向,根据自己的性情来锻炼写作才干。这也就是“习”的重要性,“习”也就是作家的习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陶冶、影响。刘勰以染丝,做木器为喻,说明风格的形成与“学慎始习”的紧密联系,同时指出作家的习染对作品的风格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才略》篇中他说道:相如好书,师范屈原,洞入夸艳,致名词宗。在《定势》篇中说道: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虽然这些说法带有一定片面性,但是他强调学习典范的作家作品,提高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以形成某种风格,这种观点是绝对可取的。一个作家在幼年时期的学习与他后天的创作是分不开的,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形之于心”到“形之于手”的过程,没有前者就无从谈及后者。而前者又和先天学习密切相连,刘勰的可贵之处在于既肯定了作家天性对写作的影响又十分重视后天的学习和熏陶,与此同时,他分清了天性和后天学习不同,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十分可贵的。

重庆炳先生在《文学理论教程》中提到文学风格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学风格和文化息息相关,这其中的文化包括时代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流派文化。每一种文化和作者的后天学习都分不开,也就是说,每一种文化对作家文学风格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最直接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作家生活于时代之中,不能不深受时代气息的感染。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要渗入时代文化的因素,表现出时代性。文学风格总是这样或那样反应时代文化的特点,形成文学的时代风格。”曹操、曹丕、曹植、孔融、王粲、刘桢等人都是典型的

代表,曹操的苍凉悲壮,曹丕的通脱清丽,曹植的豪迈忧愤,孔融的豪气直上,王粲的深沉秀丽,刘桢的贞骨凌霜,虽然各自有自己独特之处但都是在后天学习时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为时而作的文学精神,具有“梗概以任气”和“志深而笔长”的共同特点。作家接受教育时这种时代风格就融入其中,对作家文学风格的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作家是社会人,生活在民族传统文化中,就不能不受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作家在后天学习时势必会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风格中必然会有民族文化的基因,具有民族性。茅盾先生曾经评价鲁迅:“鲁迅的作品即使是形式上最和外国小说接近的,也依然有他自己的民族形式。这就是他的文学语言。也就是这个民族形式构成了鲁迅作品的个人风格。”伏尔泰也曾说:

从写作的风格来认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或一个西班牙人,就像从他面孔的轮廓,他的发音和他的行动举止来认出他的国籍一样容易。意大利语的柔和和甜蜜在不知不觉中渗入到意大利作家的资质中去。在我看来,词藻的华丽、隐喻的运用、风格的庄严,通常标志着西班牙作家的特点。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更讲究作品的力量、活力和雄浑,他们爱讽喻和明喻胜于一切。法国人则具有明彻、严密和优雅的风格。他们既没有英国人的力量,也没有意大利人的柔和,前者在他们看来显得凶猛粗暴,后者在他们看来又未免缺乏须眉气概。……要看出各相邻民族鉴赏趣味的差别,你必须考虑到他们不同的风格。除此之外地域文化在作家后天学习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作家总是生活在一定地域中的,地域文化气息在作家的后天学习中会不断显现出来。刘勰《文心雕龙》关于风格与人的问题上的探讨虽然有很多地方还不够完善,但是在研究的系统性、深刻性、细致性、创新性上已经开创了文学史上的先河,给后人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典范,比如皎然《诗式》把诗分为十九体、司空图《诗品》把诗分为二十四品都是受了刘勰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法]布封.论风格[J].译文,1957,(9).
- [2]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372.
- [3] 别林斯基论文学[M].新文艺出版社,1958:234.
- [4] 重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84,284,297.
- [5] 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茅盾评论文集(上)[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292.
- [6] 伏尔泰.论史诗//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M].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322.

心娱目的小说,所以《世说新语》着实是文赖注显,得以流传至今。

3、增广见识的有趣读本

由于刘孝标对注释工作的重视和谨慎,对待原文中提及历史典故,刘孝标觉得需要予以阐释,便不厌其烦地从史料中选择能够予以精确阐释发明的资料,读《世说新语》不仅领略名士风流,更可得富的历史知识。例如《德行》26条中《注》中有“百里奚亦何必轻于五羖之皮邪?”一句,注便引《说苑》中百里奚“五羖大夫”一典以说明。又《政事》篇9条提及“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注便于此处引出《孟子》中有关“文王之囿”的事典予以说明。

对事典的增补,不仅在理解原文上起到了化繁通络作用,更使《世说新语》的信息量更大。这些典故往往意味深长,有

着浓郁深厚的中华文化沉淀,使读者读《世说新语》一书,便获得了很多的关于古典文化的常识。

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以其征引宏富,获得了从古至今的诸多赞誉,其规模之庞大,内容之繁富完全可以看做一部与《世说新语》同样伟大的著作。但对其研究相比《世说新语》来讲,还不够深入。此文权当抛砖引玉,期待研究刘《注》的更高水准的成果的产生。

【参考文献】

- [1] 刘知已.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书店,1988:34.
- [2] 魏征.隋书[M].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3.
- [3] 刘强.世说新语会评[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105.
- [4]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403-404.

(上接012页)